

道安法師爲中國佛教事業所作的偉大貢獻

楊作舟

道安是東晉時代傑出的佛教學者。他生於西晉懷帝永嘉六年(312)。原籍河北扶柳縣，幼時父母早喪，受外兄孔氏撫養，七歲讀書，十五歲就精通五經文義，轉而學習佛法。十八歲出家，因形貌黑醜，其師不甚喜歡，使他在田間工作，他毫無怨色。幾年後，才求師給佛經閱讀，由於他的記憶力非常驚人，引起他師的重視，就送他去受戒，並允許他游訪參學。約在二十四歲時，在鄴都(今河南臨漳縣境，後越石勒建都於此)遇佛圖澄，澄觀其氣度非凡，對其他僧徒說，此人有遠識，你們所不及也。安即師事佛圖澄。

道安在鄴都隨佛圖澄十餘年，常替其師講說，解答理論難題，贏得「漆道人、驚四鄰」的美譽。至澄師寂後離開鄴都，游訪到山西護澤(今臨汾縣境)去住，此地既偏僻，又安靜，可避兵亂。繼有竺法濟、竺僧輔、竺道護等先後遠集，共同研究安世高所譯禪觀方面的《陰持入經》、《道地經》和《大十二門經》，並作了注解。

道安在護澤住不久，又和同學法汰至飛龍山(今河北涿鹿縣

境)與早年的道友僧光相見。他已放棄了「格義」學說，就和僧光互相研討禪定。《高僧傳·僧光傳》說，「安曰：先舊格義，於理多違。光曰，且當分析逍遙，何容是非先後。安曰：弘贊教理，宜令允愜，法鼓竟鳴，何先何後？」這說明僧光的思想比較保守，認爲格義是先達所傳之法，只可應用，不必再問是非。道安則不以爲然，他認爲弘揚教理，首先要求正確，先達不先達的問題，可以不必理會。這大概就是佛圖澄所說的遠識，也可以從而想見道安的氣概和風度。

《高僧傳》載，石虎死後，石遵繼位，曾派中使請道安返鄴都住華林園，並廣修寺舍。因石遵被殺，道安又於混亂中率衆去牽口山(山西境內)一帶和法汰弘化，並在太行山建立寺塔。當時社會紊亂，人民痛苦至極，而道安率衆行道精進不懈，在他的身上和道場裡面，人們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。這時安已名聞各地，慧遠即由洛陽前往參見，從他落髮出家。後來道安復回鄴都住受都寺，時年已四十五歲。至後燕，慕容儁繼稱帝後，他又率衆去山西王屋女林山，不久又渡黃河到河南陸渾縣，時襄陽名流習鑿齒聞道安高名，致書請南下弘法，他和同學弟子們走到新

野。他為廣布教化，命同學法汰率弟子四十餘人去揚州，又命同學法和去四川，他自己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到襄陽，先住白馬寺，後創建檀溪寺，建塔五層，起房四百。襄陽當時尚屬東晉，社會比較安定，道安在那裏居住十五年，得到充分發展佛教事業的機會。

據《出三藏記集》卷十五說，初經出已久，而舊譯時謬，致使深義隱沒未通；每至講說，唯叙大意，轉讀而已。安窮覽經典，鈎深致遠；其所注《般若》、《道行》、《密迹》、《安般》諸經，並尋文比句，為起盡之義，及析疑、甄解，凡二十二卷。序致淵富，妙盡玄旨；條貫既序，文理念通，經義克明，自安始也。這是考校譯本，注譯經文方面的事業。

同書卷二云，邇及桓靈，經來稍廣，安請胡佛之儔，支謙嚴調之屬，翻譯轉梵，萬里一契，離文合義，炳煥相接矣。法輪屬心，莫或條叙，爰自安公，始述名錄，銓品譯才，標列歲月。妙典可證，實賴伊人。著有《衆經目錄》五卷，這是創製經錄的事業。中國佛教有了這樣的注疏和經錄，才能承先啓後，循序發展。否則雜染無章，即使後來有像鳩摩羅什那樣的大譯師，像僧肇那樣的大學者，恐怕也會受到障礙的。

道安在襄陽，除了從事佛學研究與著述外，每年還講兩次《放光般若經》。《高僧傳》說：「四方之士，竟往師之」。可見當時法席之盛，因此就不能不制僧規。《高僧傳》卷五本傳云：

安既得為物宗，學兼三藏，所制僧尼規範，佛法憲章，條為三例：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；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之法；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。安師所制定的這些規範，在當時有良好的效果。如《高僧傳》所載，習鑿齒致謝安書中有云：

來此見道安，故是遠勝，非常道士，師徒數百，齋講不倦。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；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

差；而師徒肅肅，自相尊敬，洋洋濟濟，乃吾由來所未見。這說明道安的風範對當時佛教界影響之大，所以天下寺舍，遂則而從之。前秦苻堅曾遣使贈送外國金箔倚像莊嚴檀溪寺。東晉孝武帝曾下詔書表彰道安，並令當地官府給予優遇。

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(379)，苻堅發兵攻佔襄陽，道安和習鑿齒皆被延致。苻堅曰：「吾南伐得一人半，蓋謂道安一人，習半人也。」堅既得道安，無比器重，既迎請住五重寺(在漢長安城內)，建立道場，翻譯佛經。道安時事已六十七，他在長安的七八年中，除領導幾千人經常向其講說之外，主要是組織翻譯事業。史載、長安譯經事業始于法護，盛于道安。如曇摩難提譯《中阿含經》、《增一阿含經》、《三法度論》，鳩摩羅跋提譯《毗曇心論》、《四阿含暮抄》，僧伽提婆譯《阿毘曇八揅度論》，曇摩鞞譯《摩訶鉢羅密經抄》，耶舍譯《鼻奈耶》，他親和竺法念、道整、法和等參與翻譯工作，對譯文不確之處加以考正或勸令重譯。他在《摩訶鉢羅經抄序》上所說的翻譯有五失本，三不易，都是他的傑出創見，為後來的譯經工作指出了正確的道路。

據《高僧傳》卷五說，魏晉沙門依師為姓，姓各不同，僧俗難分。道安認為「大師之本，莫尊釋迦」。沙門之姓，應為釋氏，從此沙門之名一律冠以釋字，相沿至今，成為定論，這是道安一種別出新裁的貢獻。

道安的治學方法和學說，例如上面所引的「起盡之義」，其實就是所說的科判。良賁《仁王經疏》說：「昔有晉朝道安法師，科判諸經以為三分：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。」道安用科判的方法把佛經的內容分章分節標列清楚，研究起來就容易抓住它的中心環節；同時再用「析疑」、「甄解」的方法，對於每一個名詞或每一種句義加以分析推詳，自然「文理會通，經義克明」。

此外道安在搜求經本，考校異同方面也盡了最大的努力，如《漸備經十住明並書叙》說：

……《漸備經》恨不得上一卷，冀因緣冥中之助，忽復得之。……《小品》上兩卷，若有可尋之階，亦勸以爲意。……《楞嚴》、《須賴》，並皆與《漸備》俱至。涼州道人慧常，歲在壬申，于內苑寺寫此經，以酉年因寄，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達襄陽。……說明道安在收集和運用資料方面的精心與認真。他以這樣的治學方法進行研究和著作，養成樸實嚴緊的學風，開創了純正的佛學研究。因此他的學說在當時起着中流砥柱作用。元康《肇論疏》說：「安法師立義以性空爲宗，作性空論：什法師立義以實相爲宗，作實性論，是謂命宗爲。」又僧睿《毗摩羅詰提經義疏序》說：「自慧風東扇，法言流咏以來，雖日講肆，格義迂而乖本，六家偏而不即。性空之宗，以今驗之，最得其實。」對安師的學說備加頌揚，確是函蓋相稱的。

關於道安的學說，還可以以戒定慧三個方面來說。在戒律方面，當時雖然戒本未備，廣律也只有竺佛念譯的《鼻奈耶》十卷，他認爲戒是斷三惡道的利劍，無論在家出家都應以戒爲基礎。

道安的親教師佛圖澄的神變系出于禪修，道安自始就注重禪定止觀，是受佛圖澄的影響。他在《人本欲生經注》中，意謂禪修達於高深境界，「雷霆不能駭其念，火焦不能不能傷其慮」，並能發生種種神變，但它並不是禪修的真正目的。禪修在於契入「無本」、「無爲」而開物成務。開物是天下兼忘我，成務是無事而不適（《道地經本》）。這就是要以禪修所得到的境界中，使人忘我，盡性而造成世界的安樂，不僅僅是追求個人精神上的享受。《大十二門經序》說：「明乎匪禪無以統乎無方而不留，匪定無以周乎萬形而不碍，禪定不愆，于神變乎何有也。」這就是習鑿齒致謝安書，稱贊道安法師，「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。」其中意味深長是可以理解的。

又佛圖澄的教理以般若爲宗，道安自始就重視《般若經》的研究。他認爲研究般若經典不能單用「考文」、「察句」的方法，而披

開繁復的文句，體會它的精神實質（《道行經序》）。有了這樣的體會，才能把第一義諦與世俗諦不一不異，不即不離的義理表現在行動上。

《合放光光贊略解序》（譯意）說：沒有智慧則無往而不生窒碍，終日所言皆不合理，所以成爲八萬四千小塵勞門。有了智慧則無往而不發生良好的作用，終日所言皆合于理，故爲「萬四千波羅密」。所謂執大淨而萬行正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我們所說的「學足下足皆道場」，或者「頭頭是道」，也不外乎這個道理。戒定慧三學是成佛的梯階，道安都有卓越的見解。

道安的博學多才、通經明理，文學素養，更爲傑出，當時長安衣冠子弟多往請教，社會名流莫不推崇，有「學不師安，義不中難」之說。可以說他的一言一行在當時都起着典範作用，並爲後來佛法的弘傳建立了良好的基礎，中國佛教信徒永遠懷念着他。

道安於苻秦建元二十一年（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年385）圓寂於長安五重寺，終年七十四歲。他的著作現存的僅有《人本欲生經注》等經、論、序二十五卷、篇，可惜遺失的著作還很多。

道安法師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位傑出的學者，是四大譯師之一，中國翻譯史上亦有其名。梁啟超先生曾評價道安，假使我佛教失一道安，能否蔚爲大國，吾蓋不敢說也。佛教之有道安，殆如歷朝創業期得以良相，然後開國規模具也。

《戶縣地名志》說，前秦建元十五年（375）襄陽習鑿齒與釋道安入秦後，曾寓居戶縣，後其寓處陸續居住農民成村，故以習之名命爲鑿齒村。村西三里有道安墓，村西北有道安寺，文革被毀，現又修葺。明、清時代戶縣行政區劃有道安里之設稱，含有戶縣人民對道安法師作爲紀念的意義。